

中东社会转型中的非阿拉伯因素

土耳其正义与发展党政权的外交政策成因分析

李 智 育

摘 要：正义与发展党上台执政以来，土耳其在外交舞台上日趋活跃，在一些国际问题上采取别具特色的政策和立场。无论是其全力推动入盟进程的努力，还是“零问题”外交主张、多元化务实外交的做法等，都引发学界的广泛关注。本文借助罗斯诺的层次分析法，从土耳其国内政治的视角切入，在个体、政府、社会三个层面对正发党政府外交政策的背景和成因进行分析。

关 键 词：土耳其外交政策；正义与发展党；伊斯兰；国内政治；层次分析法

作者简介：李智育，北京外国语大学亚非学院土耳其语副教授（北京 100089）

文章编号：1673-5161（2012）05-0055-16 中图分类号：D801 文献标识码：A

外交政策是一个独立主权国家的政治行为与公共政策，受到国内结构与国际体系双重互动的塑造。要真正理解一个国家的外交政策，必须研究其政策产生的原因与背景。詹姆斯·N·罗斯诺（James N. Rosenau）提出，外交政策的产生受个体、角色、政府、社会、体系五个变量的影响，对于不同国家来说，各个变量的相对效力不同，对外交政策的影响力也不同。

土耳其是西亚北非地区传统大国，又属于新兴国家范畴，近年来，其外交活跃且具特色，国内学者对正义与发展党（以下简称“正发党”）执政后土耳其

白云真：《当代中国外交的历史经验：国家与社会关系的解读》，载《国际展望》2010年第1期。

James N. Rosenau, *The Scientific Study of Foreign Policy*, London: Francis Printer, 1980, pp128-129.

外交的研究著述颇丰。本文将参照罗斯诺的层次分析法，从国内政治的视角切入，在个体、政府、社会三个层面上来解读正发党政府对外政策的背景和成因。

一、个体层面的分析

领导人在土耳其政治文化及政党体系中一向占据重要地位，在外交政策上也不例外。决策者个人的社会经历、人格魅力、政治素质、专业知识、情感与偏好等因素都会对外交政策产生影响。

（一）达武特奥卢——外交理论建构者

现任土耳其外长的达武特奥卢是学者出身，从政前一直在大学任教。2002年年底正发党上台后，他被任命为总理外交政策首席顾问，2009年5月出任外长。达武特奥卢对正发党政府外交政策的影响主要体现在理论建构上。他于2001年出版的专著《战略深度》是学界分析土耳其现行外交政策的重要依据之一。

达武特奥卢重视在新的国际战略格局中发挥土耳其的地缘优势，强调外交的重点区域。他在《战略深度》中指出，一个国家的地理位置是固定不变的，但这一地理位置所赋予的地缘政治的维度却可根据国际力量对比的变化而重新调整。占据地缘政治位置本身并不重要，重要的是运用适当的外交政策使其发挥作用。土耳其应立足于地缘政治优势逐步向世界开放，灵活处理国际经济、政治和安全关系。从这个意义上讲，对土耳其来说具有重要战略意义的区域有：巴尔干、中东和高加索在内的陆地区域；黑海、亚德里亚海、东地中海、红海、波斯湾、里海在内的海洋区域；欧洲、北非、南亚、中亚和东亚在内的大陆。

长期以来，土耳其在追求“脱亚入欧”的战略目标时，对自身的大陆属性常有一种迷失感，介于欧亚之间，却难为两方接纳。达武特奥卢对土耳其传统

邓红英：《土耳其外交转型析论》，载《现代国际关系》2010年第10期；胡少聪：《土耳其外交新思维及其影响》，载《国际问题研究》2011年第4期；董漫远：《伊拉克战争后的土耳其外交》，载《国际问题研究》国际关系专论；张来仪：《新世纪土耳其与伊朗关系走向探析》，载《西亚非洲》2009年第8期；谢立忱：《认同视角下的土耳其对外政策》，载《西亚非洲》2011年第9期；张春：《土耳其对非洲战略与政策评析》，载《西亚非洲》2011年第9期；王泽胜：《土耳其对西巴尔干地区政策的新变化》，载《西亚非洲》2011年第9期；郑东超：《土耳其新中东政策辨析》，载《现代国际关系》2011年第1期；郑东超：《土耳其外交的战略深度主义》，载《国际资料信息》2011年第1期；郑东超：《土耳其外交新政辨析》，载《亚非纵横》2011年第6期。

Ahmet Davutoğlu, *Stratejik Derinlik*, Istanbul: Küre Yayınları, 2008, pp116-118.

的“西向政策”进行了反思。他提出，土耳其以北约的名义积极参与的地区行动有时会导致其被自身所在地区孤立，土耳其未来的外交难题之一便是如何协调其地区政策与北约重建国际秩序的努力之间的关系。因为很多国家仍然不把土耳其当做战略伙伴，而是将其视为廉价劳动力，与在欧洲的行动相比，更愿意让土耳其参与在中东的行动。要想扭转这种局面，土耳其必须发展东欧和巴尔干战略，并根据这一战略调整对北约的政策。

达武特奥卢认为，付出高额安全成本却得不到经济利益是土耳其与西方关系最基本的特点。在中东经济资源问题上没有发言权却充当保护地区治安的宪兵之职，并想借此保证国内安全，是一个看似容易实则危险的游戏。他主张土耳其应积极参与中东和平进程，因为该进程并非只为解决阿以冲突，它对土耳其的安全利益也很重要，同时也为土在地区政治中扮演新角色提供了可能。

由于历史、民族、宗教等原因，土耳其与周边国家存在矛盾，有些问题久拖不决，限制了土耳其地区大国作用的发挥。针对土耳其传统的安全外交政策，达武特奥卢提出，土耳其迄今采取的都是安全参数主导的外交政策。一个在全球经济、政治和文化问题上没有发言权的国家，只靠安全参数很难赢得国际声望。

达武特奥卢认为亚洲战略的关键点在中亚。他指出，土耳其一方面应借助与美国、欧盟的关系制定和发展亚洲政策，另一方面应密切关注亚洲内部制衡关系的变化，实施积极的外交以免被孤立于亚洲集团之外。从国际政治经济的新发展和地缘经济资源配置角度看，21世纪的国际竞争集中在亚洲，之后将会是非洲。

达武特奥卢的外交思想奠定了正发党政府外交政策的理论基础。

(二) 埃尔多安——土耳其外交的决策者

土耳其外交的“总设计师”是达武特奥卢，但真正的决策人无疑是总理埃尔多安。由于在政坛无可争议的强势地位，埃尔多安的所有决策，包括外交决策的影响无人比肩。他在塞浦路斯问题和库尔德问题上的立场就是很好的例证。这两个问题在土耳其十分敏感，极具争议性，从土耳其传统政治文化来看，埃

Ibid. pp233-236.

Ibid. p423.

Ibid. p499.

Ibid. p288.

尔多安在塞浦路斯问题上支持“安南计划”，提出库尔德新思维，都是冒风险的做法。但面对军方和民族主义者的强烈反对，埃尔多安仍然坚持进行新的尝试。

在外交上，埃尔多安不仅是决策人，也是积极的实践者。据统计，自2003年3月就任总理至2009年底，埃尔多安共出访233次，足迹遍及全球81个国家。2005年正式开始的入盟谈判举步维艰，在全球金融危机的大背景下，欧洲经济持续低迷，使得国内对入盟必要性的质疑声不断。入盟受挫后，正发党政府着手推行多元外交，努力扮演地区大国乃至全球力量的角色。特别是从第二任期开始，埃尔多安的注意力明显转向了中东，积极参与地区事务，扮演调停人角色。土耳其先后促成了以色列—叙利亚、以色列—巴基斯坦、阿富汗—巴基斯坦、巴基斯坦—伊朗、伊拉克—叙利亚、格鲁吉亚—俄罗斯、伊朗—西方、波黑—塞尔维亚之间的对话以及伊拉克的逊尼派与什叶派之间、黎巴嫩各派别之间、巴勒斯坦对立派别哈马斯和法塔赫之间的对话。这些努力虽然有不少无果而终，但土耳其的调停人角色得到了地区国家和国际社会的认可，其致力于地区和平的形象也为土耳其赢得了赞誉。土耳其经济与社会调查基金会（TESEV）2010年的民调显示，78%的阿拉伯人认为土耳其应该在巴以冲突中担任调停人角色。

在外交决策过程中，埃尔多安的“伊斯兰情结”发挥了重要作用。埃尔多安毕业于伊玛姆高中，先后加入过民族救国党和繁荣党，具有深厚的伊斯兰背景。他信仰坚定，重视伊斯兰团结。尤其是在巴勒斯坦问题上，他旗帜鲜明，先是公开指责西方对得到75%支持率的哈马斯不够尊重，后又不惜与多年的战略伙伴以色列反目。在2011年的联大会议上发表演讲时，埃尔多安也明确表

“安南计划”是指由前联合国秘书长安南所提议的将塞浦路斯南北之领土以邦联制组成塞浦路斯联合共和国。

“Başbakan Recep Tayyip Erdoğan, 7 yılda rekor kırdı”,
<http://habermerkezi.wordpress.com/2010/02/24/basbakan-recep-tayyip-erdogan-7-yilda-rekor-kirdi>
Sami Kohen, “Dış politikada yeni ‘sektör’: Arabuluculuk”,
<http://www.milliyet.com.tr/Yazar.aspx?aType=YazarDetay&KategoriID=2&ArticleID=1157426&PAGE=1>.

Meliha B. Altunışık & Lenore G. Martin, “Making Sense of Turkish Foreign Policy in the Middle East under AKP”, *Turkish Studies*, Vol. 12, No. 4, December 2011.

Aylin S. Görener & Meltem S. Ucal, “The Personality and Leadership Style of Recep Tayyip Erdoğan: Implications for Turkish Foreign Policy”, *Turkish Studies*, Vol.12, No. 3, September 2011
“Erdoğan Hamas’ı savundu, Batı’yı suçladı”,
<http://www.timeturk.com/tr/2009/01/18/erdogan-hamas-i-savundu-bati-yi-sucladi.html>.

示“土耳其无条件地支持巴勒斯坦国的国家身份”。在处理与被西方视为“异类”的伊斯兰国家关系时，埃尔多安我行我素，表现出“超人的勇气”。2009年6月，在伊朗大选结果尚存争议的情况下，他便致电内贾德，祝贺他当选。他还不顾西方批评和国际刑事法庭的逮捕令，邀请苏丹总统巴希尔参加2009年11月在伊斯坦布尔召开的伊斯兰会议组织会议。

有分析认为，埃尔多安对国际政治的认识非黑即白，具有二分倾向。他在外交场合的表现独具个性，有一定的“不可控性”，外界对此褒贬不一。在2009年的“达沃斯经济论坛”上，埃尔多安与以色列总统突起争执，指责以色列犯了反人类罪，之后在众目睽睽之下愤然离场。虽然这一举动导致土以关系下滑，但埃尔多安回国时却受到英雄般的欢迎，在中东的支持率大幅攀升，土耳其在阿拉伯世界的影响力也得到了迅速提升。2011年底，法国议会通过了对否认亚美尼亚种族灭绝的行为进行惩罚的议案后，埃尔多安在一次公开演讲中说，“法国从1945年起屠杀了大约15%的阿尔及利亚人。如果法国总统、尊敬的萨科奇不了解这场屠杀，可以回家问他爸。他40年代曾在阿尔及利亚服役。”埃尔多安口无遮拦，瞬间决断的特点，常令土耳其外交部门措手不及。

执政地位稳固，经济快速发展，使埃尔多安的自信心不断增强。2011年6月12日，正发党以压倒性优势赢得第三次大选，当晚埃尔多安发表演讲，指出正发党的胜利是土耳其的胜利，同时也是中东、高加索、巴尔干的胜利。他称，土耳其民主已经成熟，足以成为地区和世界的榜样了。作为强势总理，埃尔多安将继续统揽土耳其外交，并使外交政策带上其个性色彩。

二、政府层面的分析

王逸舟曾指出，任何一个国家都非铁板一块，有层次的区分和利益的分化，因此外交政策研究不应忽视国内政治和社会的复杂性，应当研究外交自身利益

“BM konuşmasının tam metni”,
<http://www.usasabah.com/Siyaset/2011/09/23/erdoganin-bm-konusmasinin-tam-metni>.

Aylin S. Görener & Meltem S. Ucal, “The Personality and Leadership Style of Recep Tayyip Erdoğan: Implications for Turkish Foreign Policy”, *Turkish Studies*, Vol.12, No. 3, September 2011.

“Erdoğan: Sarkozy Cezayir’deki Soykırımı Bilmiyorsa Babasına Sorsun”,
<http://www.sondakika.com/haber-erdogan-sarkozy-cezayir-deki-soykirimi-bilmiyorsa-3211371>.

“Erdoğan’ın balkon konuşması-Tam metin”,
<http://www.yesilgazete.org/blog/2011/06/12/erdoganin-balkon-konusmasi-tam-metin>.

和它所代表的各种利益，研究不同外交政策背后的利益组合及博弈。

1923年土耳其共和国成立以来，保证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一直是其首要的国家利益。远离落后的中东、融入西方，既是土耳其外交政策的主导思想，也是包括文官和军人在内的凯末尔世俗主义精英为之奋斗的目标。正发党政府上台伊始，就在入盟问题上展现出前所未有的决心。除根据欧盟标准在国内进行大刀阔斧的改革，在阻碍其入盟的外部因素——塞浦路斯、亚美尼亚等问题上立场的转变同样引人注目。土耳其与欧盟成员国希腊因塞浦路斯问题一直关系紧张，埃尔多安先是于2003年6月前往希腊出席欧盟峰会，后于2004年5月对希腊进行正式访问，其希腊之行展现了正发党政府改善土希关系的决心。另外，正发党政府不顾国内阻力，积极支持联合国旨在统一塞岛的“安南计划”，同时致力于改善与亚美尼亚的关系。2003年，土议会拒绝美军过境进攻伊拉克，除了有国内民众反对的因素，正发党政府努力协调与欧盟的立场也是重要原因。当时主要欧洲国家都反对美国进攻伊拉克，正在向欧盟靠近的土耳其在此问题上也选择了站在欧洲一边。正发党政府在第一个任期中所采取的举措，无论是国内改革还是对外政策的调整，都是为配合入盟进程。

正发党推行以入盟为中心的外交政策的做法，主要源于对巩固和加强自身执政合法性的需求。2001年，土耳其经济跌入低谷，政局不稳，贪腐成风，民众对传统政党完全丧失了信心。正发党作为“全新的政党”在2002年大选中以34%的优势获胜，表面上看具备了执政合法性，但其伊斯兰背景却像一颗随时可能引爆的“炸弹”。毕竟在土耳其传统政治精英眼中，伊斯兰背景就是非法性的象征。军队和凯末尔主义精英拒绝任何偏离国家世俗化的政策，这就迫使伊斯兰政党将自己的言行严格限定在世俗体系参数之内。

土耳其军队既是凯末尔世俗主义原则的维护者，又是世俗化的国家体制和现存秩序的维护者。当土耳其出现违背凯末尔世俗主义原则的伊斯兰政治时，军队总会坚决反对。20世纪六十至八十年代土耳其军队曾发动过三次政变，而1997年2月28日导致埃爾巴坎政府辞职的“软政变”，更是正发党心中挥之不去的阴影。埃尔多安本人的入狱经历和司法官司也使他意识到，面对强大的世俗势力，必须寻求民主以保护思想、言论和宗教自由。埃尔多安的政治权力是通过民主获得的，对他而言，民主就意味着保护和支持。正发党自称是保守的

参见王逸舟：《有关中国外交政策分析的几点思考》，载《外交评论》2010年第4期。

刘云：《土耳其的军队与政治现代化的关系》，载《宁夏社会科学》，2002年第3期。

民主党，也是为了避免被贴上伊斯兰政党的标签。

加入欧盟不仅有利于巩固和加强正发党政府的执政合法性，更为重要的是，它为土耳其的社会和政治改革提供了明确的指南。从这个意义上讲，入盟的进程比结果更具意义。正发党上台后以入盟为导向，推行了一系列政治改革，逐渐减少军队在政治体系中的影响，同时通过扩大民主政治和公民自由，削弱土耳其政治体系中凯末尔世俗主义者的作用。虽然正发党政府进行的改革极大地限制了军队，但军方认为，加入欧盟有助于解决政治伊斯兰、土与希腊的关系、经济困难、库尔德问题等，因此对入盟进程非常支持。

2007年以来，因一个匿名电话引发的 Ergenekon 事件不断升级，军队的处境愈发艰难。在宪法法院于2008年夏天否决了以反世俗为由要求取缔正发党的诉讼案之后，埃尔多安即着手清除可能阻碍其发展的势力，重塑了司法系统和文官—军队关系，军队的影响力不断被削弱。

2011年7月29日，土耳其总参谋长，海、陆、空三军司令集体辞职，引发国内外一片震惊。总参谋长科沙内尔（Kosaner）在告别信中说：“目前共有250名将军、军官、军士在押，上述拘捕是不符合法规、权利、正义和良心的……我们都注意到，审讯和长期羁押他们的就是为了制造一种土耳其武装部队是犯罪机构的舆论。有些媒体利用这个机会，通过各种虚假消息、诽谤和指责，煽动我们伟大的民族与自己的武装部队为敌”。在此次集体辞职事件半年后，土耳其前总长巴什布（Basbug）又因涉嫌企图暴力推翻政府、阻碍政府履职而于2012年1月6日被捕。在与文官政府的博弈中，昔日强大无比的军队似乎已经败下阵来。此外，主要反对党——共和人民党也辉煌不再，反对正发党政府的媒体集团相继垮台。在土耳其的外交决策中，传统政治精英的影响力锐减，取而代之的是能源、贸易和运输部，甚至内务部的作用都在变得日益重要。入

M. Hakan Yavuz, *Secularism and Muslim Democracy in Turkey*,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9, pp202-223.

Ergenekon 案件涉及一起军事政变，据称部分军官 2003 至 2004 年密谋推翻正发党政府，后因时任总长厄兹科克反对未遂。目前案件仍在调查之中。因涉案被捕的已有数百人，除了各级军官，还包括一些政客、记者、知识分子等。参见

http://tr.wikipedia.org/wiki/Ergenekon_Operasyonu。

“IşıkKošaner’denvedamasajı”

<http://www.cnnturk.com/2011/turkiye/07/30/isik.kosanerden.veda.mesaji/624510.0/index.html>.

“İlker Başbuğ tutklandı”

<http://www.cnnturk.com/2012/guncel/01/05/ilker.basbug.tutuklandi/643478.0/index.html>.

Kemal Kirişçi & Neslihan Kaptanoğlu, “The Politics of Trade and Turkish Foreign Policy”, *Turkish Studies*, Vol. 47, No. 5, September 2011.

盟努力不但巩固了正发党的执政合法性,还改变了土耳其国内政治力量的对比。

近期,由于欧债危机持续发酵,土耳其经济却不断向好,入盟进程似乎正在日益淡出人们的视线。此外,土耳其政府对塞浦路斯在东地中海探测油气表现的强硬态度,以及欧盟指责土耳其政府拘捕几十名记者的行为限制了新闻自由,导致土欧关系紧张。尽管如此,融入西方文明是土耳其几代人的梦想,无论是出于主观愿望还是客观需要,土耳其政府都不会改变入欧方向。土耳其前驻美使馆参赞巴巴勒(Babalı)撰文指出,从土耳其所处的地理位置、文明间对话及欧洲穆斯林少数民族的未来、能源安全、土耳其的人口价值、欧盟的内部安全(非法移民、有组织犯罪问题)、土耳其的长期稳定和保证改革进程的持续性等方面考虑,土欧彼此需要对方。克里士基(Kirisci)也指出,与欧盟关系的疏远,不利于土耳其的“零问题”外交,也不利于土耳其的外贸和商业利益。尽管相对于其他地区,土耳其对欧盟的贸易额在下降,但土欧贸易比大多数地区新伙伴更具兼容性。而且,对土耳其的直接投资大部分来自欧洲,同时还伴有工业技术的转让。更为重要的是,吸引欧盟以外国家来土耳其投资的正是其与欧盟之间的关税同盟,以及因看好土耳其入盟前景而对其经济产生的信心。正发党在2011年的竞选纲领中也表示,成为欧盟正式成员国是土耳其的战略目标,尽管有些欧洲国家无端反对,但正发党将继续为入盟采取必要步骤。

三、社会层面的分析

从社会层面来看,影响正发党政府外交政策的因素主要有三个:库尔德问题、伊斯兰团体、伊斯兰中小企业家。

(一) 库尔德问题

库尔德民族主义和伊斯兰团体一向被认为是对于新生土耳其共和国的双重威胁。从凯末尔建国起,库尔德问题便一直威胁着土耳其的统一与安全。成立于

“Babalı: ‘AB Türkiye’yi kaybetmek üzere”
<http://www.euractiv.com.tr/genisleme/analyze/babali-ab-turkiyeyi-kaybetmek-uzere-009477>.
Kemal Kirişçi & Neslihan Kaptanoğlu, “The Politics of Trade and Turkish Foreign Policy”,
Turkish Studies, Vol. 47, No. 5, September 2011.
Ibid.
Bülent Aras & Rabia Karakaya Polat, “Turkey and the Middle East: frontiers of the new geographic imagination”, *Australian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Affairs*, Vol. 61, No. 4, December 2007.

20 世纪七十年代的库尔德工人党武装反抗政府，造成大量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土耳其军队为清剿库尔德工人党采取的军事行动，却遭到了欧盟的强烈干预。欧盟不断施压，要求土耳其改善人权状况。

入盟进程是土耳其政府改变对库尔德政策最重要的催化剂。正发党上台之前就许诺解决库尔德问题，执政后也出台了一些改善库尔德人权利的政策，包括准许使用库尔德语教学，允许父母给孩子取库尔德语名字，在国家电视台推出库尔德语频道等。2005 年，埃尔多安在东南部重镇迪亚尔巴克尔演讲时，承认土耳其存在库尔德问题。2009 年夏天，正发党更是推出了“库尔德新思维”，计划扩大库尔德人的政治、文化权利，通过赦免政策鼓励库尔德工人党成员放下武器，推行包括权力下放、实行有限的地区自治等在内的政治改革。

由于土耳其的库尔德分裂分子长期在伊拉克北部活动，正发党政府非常重视对伊拉克关系，与包括库尔德人、土库曼人、逊尼派在内的伊拉克不同宗教和种族的组织都建立了关系。2003 年美国入侵伊拉克，土耳其担心出现独立的库尔德斯坦，担心战争会使伊拉克乃至地区局势混乱。在战前，土耳其就主持成立了伊拉克邻国倡议活动，与包括伊朗、叙利亚、约旦、埃及、沙特、科威特和伊拉克在内的国家定期召开会议。2005 年欧盟和伊斯兰会议组织也加入了这一活动。另外，土耳其支持逊尼派参加伊拉克 2005 年 12 月的选举也早已是公开的秘密。土耳其担心伊拉克库尔德人的独立或自治会对本国库尔德人产生示范作用，担心一个软弱的伊拉克中央政府会导致库尔德工人党坐大，希望看到伊拉克有一个强大的中央政府。

土耳其与叙利亚和伊朗长期关系紧张，部分也是因认为叙利亚、伊朗暗中支持库尔德工人党。达武特奥卢大力推行“零问题”外交政策，也有平稳解决库尔德问题的考虑。“零问题”是土耳其处理与邻国关系的目標，土耳其希望解决与邻国关系中的所有问题，至少是尽可能地减少问题。

1999 年，库尔德工人党主席奥贾兰被捕并被押送回国，土叙关系开始改善。正发党上台后更是大力发展对叙关系，两国不但签署了自由贸易协定，还实行互免签证政策，埃尔多安和阿萨德总统也发展了非常亲密的私人关系。但 2011 年叙利亚政局出现动荡以后，土耳其力促阿萨德政权实行民主改革未果，土叙交恶。2011 年 9 月反阿萨德的“叙利亚全国委员会”在伊斯坦布尔成立，土耳其

康静：《土耳其正义与发展党执政下的库尔德政策述评》，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硕士学位论文，2010 年 5 月。

其俨然成为反对叙利亚现政权的“先锋”。有分析说，埃尔多安政府如此坚定地站到阿萨德的对立面，一方面是因对阿萨德迟迟不肯落实有关民主改革的承诺感到不满，另一方面是因为它认为库尔德工人党属叙利亚现政权阵营，希望通过推翻它达到一石二鸟的效果。

在伊朗方面，2003年美军入侵伊拉克后，伊朗担心被美国从阿富汗和伊拉克两面夹击，不敢再冒失去土耳其的风险，因此停止了对库尔德工人党的支持，土伊关系随即得到极大改善。

然而，库尔德问题的解决任重道远。正发党的库尔德新思维遭到反对党、左翼和自由派的强烈反对，被指责为是旨在分裂国家的政策。新思维没有真正实施便夭折了。2011年库尔德工人党从伊拉克领土向土耳其军队发动了几次攻击，使得部分原本支持新思维的土耳其民众也改变了立场。

（二）伊斯兰团体——葛兰运动

葛兰运动是当代土耳其伊斯兰运动最为突出的代表，主张不同宗教和文明间的对话。它的发起人是伊斯兰改良主义宗教人士法图拉·葛兰（Fetullah Gulen）。亚伍兹（Yavuz）认为，葛兰是塑造土耳其“新伊斯兰”的引擎，是第一位突厥—奥斯曼民族主义者，希望通过教育机构、大众媒体和金融网络塑造一个有凝聚力、守纪律的组织。葛兰运动是土耳其最富有的宗教团体之一，建立了强大的金融帝国，有杂志社、报社、电视台、电影公司、广播公司、保险公司和一个叫“亚洲金融”的机构。此外，葛兰网络还包括大学、中学、学生宿舍和夏令营，其教育活动主要由安纳托利亚和伊斯坦布尔的商人资助支持。

葛兰认为，伊斯兰让人民服从议会、领导人或法律，与民主并不矛盾。为

Cengiz Çandar, “‘Sıfır-sorunun cezaesi’nden ‘çok sorunlu’ geleceğe...”, <http://www.hurriyet.com.tr/yazarlar/19305054.asp>.

Soner Cagaptay, “Why Syria and Iran are becoming Turkey’s enemies, again”, <http://www.cagaptay.com/10612/syria-iran-turkey-enemies>.

法图拉·葛兰 1941 年生于土耳其东部的埃尔祖鲁姆，自幼接受宗教教育，1958 年获得宣经师资格，即前往伊兹米尔讲经布道。他接受了新苏菲主义思想家赛义德·努尔西有关宗教宽容、自由民主和科学理性的思想，并在实践中形成调和信仰与理性、传统与现代、宗教与科学的思想体系，被称为当代土耳其非官方宗教代言人（参见李艳枝：《信仰对话：当代土耳其民众伊斯兰运动的主导话语——法图拉·葛兰及葛兰运动解析》，载《西亚非洲》2009 年第 2 期）。1999 年葛兰被指控为破坏世俗主义，即前往美国至今。

M. Hakan Yavuz, “Search for a New Social Contract in Turkey; Fethullah Gülen, the Virtue Party and the Kurds”, *SAIS Review* 19.1, 1999.

Filiz Başkan, “The Fethullah Gülen Community: Contribution or barrier to the consolidation of democracy in Turkey?”, *Middle Eastern Studies*, Vol. 41, No. 6, November 2005.

了民主，任何公民、社会组织都不应与政府为敌。葛兰运动无论在言论上还是在行动上都与政府走得很近。2010年，正发党政府就制定新宪法举行全民公决前，葛兰公开呼吁人民积极参与投票。他表示，“这是走向民主的重要一步。可能的话，即使是在坟墓里的人也应该站起来去投赞成票。”出于对扩大宗教自由的渴望，二者对新宪法寄予了同样的期待。

2012年初，葛兰运动的官网介绍了纳兹勒·厄勒扎克(Nazlı Ilıcak)的新著。厄勒扎克认为，葛兰运动的势力越来越大，确实影响着执政者的选票。从2007年开始对葛兰运动进行研究的美国休斯敦大学社会学系教授海伦·罗斯·伊博(Helen Rose Ebaugh)认为，葛兰运动不是政治性的，而是宗教的，民间的。虽然有人提出葛兰运动为建立伊斯兰国家而渗透到军队和政府部门，但拿不出证据。她还指出，在土耳其大约有5-7百万葛兰运动的支持者，从统计数字上看，不排除政府里有葛兰运动支持者的可能。在土耳其国内，有关葛兰运动追随者进入政府机构和警察部门的说法虽然盛行却无法证实。造成这种情况的主要原因是苏非教团在土耳其被明令禁止，宗教人士长期受到世俗主义精英的“压制”，不愿公开承认自己的伊斯兰身份。葛兰本人也极力否认自己与苏非教团的关系，称“我不属于苏非教团，与任何一个苏非教团都没有联系。”虽然虽然没有具体证据证明社会上流传的这些说法，但上述作家和学者的观点至少证明，葛兰运动的力量强大到足以影响政府。

在外交政策方面，正发党与葛兰运动在很多问题上立场一致，特别是在入盟问题上，二者的主张如出一辙。葛兰曾明确表示，“我认为土耳其必须加入欧盟。欧盟应该接纳多种宗教，它并不是一个基督教俱乐部。”另外，正发党政府对中亚的外交政策也与葛兰运动一脉相承。葛兰运动特别强调中亚的重要性。早在苏联刚刚解体时，葛兰便呼吁在中亚创办学校，开展工商业活动，以填补

Ibid.

“İşte Fethullah Gülen’in Referandum Yorumu”, <http://tr.fgulen.com/content/view/18551/11>.

1944年生，《晨报》专栏作家。1999年当选美德党伊斯坦布尔议员，2001年宪法法院取缔美德党后，她被禁止从政5年。2007年要求竞选正发党议员遭到拒绝。参见 http://tr.wikipedia.org/wiki/Nazlı_Ilıcak

“Cemaat Ergenekon’a paravan yapıldı”, <http://tr.fgulen.com/content/view/20219/11>.

“Gülen Hareketi’ne Yönelik Korkular İdeolojik”, <http://tr.fgulen.com/content/view/18718/11/>, 2012年2月11日登录。

“Fethullah Gülen’in Düşünce sisteminde Tasavvuf ve Modernite”, <http://tr.fgulen.com/content/view/10028/140/>.

“Dünyada Zihni Kirlilik Var”, <http://tr.fgulen.com/content/view/8134/11/>.

那里的社会、政治和文化真空。葛兰提出，在一个日益全球化的世界里，要想在力量平衡中拥有发言权，首先要与邻国、与其他有共同点的国家建立联盟；对那些非盟友国家，也不应为敌。葛兰主张在不损害与欧洲关系的前提下对亚洲开放。他认为，从太平洋到远东、从欧洲到各突厥共和国、从非洲到印度次大陆的丰富资源对土耳其来说是更好的战略选择，可以在未来使土耳其拥有更多讨价还价的余地。此外，葛兰还提出，伊朗、沙特等国虽是伊斯兰国家，但不能容忍异己，其他阿拉伯国家也是如此，而土耳其的共和体制和民主都取得了相当牢固的地位，所以比其他伊斯兰国家更适合穆斯林居住。从上述观点不难看出，与正发党政府一样，葛兰也希望土耳其能够成为伊斯兰世界的领袖，在世界上发挥更重要的作用。

尽管正发党政府领导层都有伊斯兰背景，但包括埃尔多安在内的部分领导人在某些问题上与葛兰运动的主张不尽相同。葛兰运动持现代城市宗教观，强调如果必须改变外交政策，也应以其他方式而非强力方式改变。另外，葛兰坚决反对“民族观”。正发党是从埃尔巴坎的繁荣党分离出来的政党，其创始人脱离不了民族观背景。相对于葛兰运动来说，以埃尔多安为代表的正发党更为传统。

葛兰和埃尔多安在某些外交政策上有明显分歧，其中最突出的例子是二人对待蓝色马尔马拉号事件截然不同的态度。2010年5月，前往加沙运送人道主义援助的船只蓝色马尔马拉号遭到以色列军人袭击，导致9名土耳其人丧生。事后埃尔多安总理强烈谴责以方做法，要求以方正式道歉并赔偿损失。而葛兰在2010年6月接受《华尔街日报》采访时却批评援助加沙的行动组织得不好，提出应先与以色列达成协议再派船过去。巴以冲突和人道主义援助是伊斯兰世界最为关注的问题，葛兰的上述立场在土耳其国内引发了很多争议，不少人认为葛兰在这个问题上成了美国和以色列的代言人。另外，有分析指出，2011年年底埃尔多安因病手术期间，葛兰没有表示慰问，表明两人关系确实出现了问

Fethullah Gulen, "Islam OrtakPazari" ya da "Islam UlkeleriBirligi" gibiprojelerenasilbakiyor? fgulen.com, 2011年12月26日。

Fethullah Gulen'in dinedayalibirdevletkurmagayesivehedefivarmidir? fgulen.com.

“民族观”是埃尔巴坎发起的政治思潮，认为土耳其可以依靠自己的人力和经济实力实现振兴，在保持自己价值观的同时从历史中吸取力量，加快发展步伐。

“Fethullah Gülen ne demekistedi?”,
<http://www.haberturk.com/yazarlar/serdar-turgut/666215-fethullah-gulen-ne-demek-istedi>.

题。如果埃尔多安与葛兰之间出现大的分歧,将对土耳其的内政外交产生影响。

(三) 伊斯兰中小企业家

正发党上台之初就声称它代表的是政治、经济和文化精英之外的群体。20世纪九十年代,土耳其经历了几次经济危机,2001年又爆发了一次严重的经济危机,之后时任经济部长德尔维什(Dervis)发起经济改革。正发党上台后继续推行德尔维什的改革计划,得到了来自被称作“安纳托利亚老虎”的伊斯兰中小企业家们的强烈支持。民主制的发展和经济模式的转换带来的是社会阶层的重新分化,边远群体也逐渐纳入中心区域的政治和经济建构中,从而为伊斯兰政党提供了经济和社会基础。经济的快速增长带动了自信心的增加,新兴经济力量在与旧的官僚体制的竞争中脱颖而出,在政府决策过程中的作用也明显增加。

正发党政府大力推行中东外交,与受全球化推动的土耳其社会经济结构的变化直接相关。20世纪六七十年代土耳其采取进口替代工业发展模式,受益者是大工业、大企业。80年代土耳其开始实施出口导向经济战略,中小企业又兴旺起来。出口导向增长战略意味着土耳其外交开始为新兴企业寻找新的市场。随着新的工业中心在安纳托利亚出现,这些“安纳托利亚老虎”及其控制的媒体、文化和教育机构构成了伊斯兰精英,代表广大的安纳托利亚穆斯林群体。他们盯上了那些工业化国家、包括土耳其大企业以前鲜有涉足的市场,其中包括中东市场。在这些企业的推动下,土耳其与邻国的贸易额不断增长,2010年土耳其对中东出口比2005年翻了一番。同年土耳其对伊拉克出口额60亿美元,而2006年这一数字才25亿美元,其中大部分贸易都是与伊拉克北部的库尔德人进行的。随着内外经贸活动的兴起,安纳托利亚东南省份的就业率和富裕程度得到了提高,这反过来也为正发党赢得了更高的支持率。

达武特奥卢也指出,对那些努力从重要的替代政策转为出口导向发展模式的国家来说,追求经济利益应该是其政策的主要组成部分。可以说,为了满足

“Cemaatve AK parti”, <http://yenisafak.com.tr/Yazarlar/?i=30170&y=OzlemAlbayrak>.

李艳枝:《土耳其伊斯兰复兴运动研究》,南开大学博士论文,2009年。

刘云:《全球化背景与当代土耳其伊斯兰主义的社会基础》,载《西亚非洲》2006年第2期。

Meliha B. Altunışık & Lenore G. Martin, “Making Sense of Turkish Foreign Policy in the Middle East under AKP”, *Turkish Studies*, Vol. 12, No. 4, December 2011.

Meliha B. Altunışık & Lenore G. Martin, “Making Sense of Turkish Foreign Policy in the Middle East under AKP”, *Turkish Studies*, Vol. 12, No. 4, December 2011.

土耳其国内，特别是工商业利益集团日益增长的要求，经济和贸易在外交议程中占据了主要位置。土耳其总理和总统在会见外国领导人时也从不避讳商业问题，甚至会为解决这些问题而施加压力。此外，土耳其高层每次出访也都有大批伊斯兰中小企业家随行，仅以 2010 年 3 月居尔总统出访喀麦隆和刚果为例，随行人员除 3 名部长、4 位议员外，还有 147 名商人。

企业家们抱怨欧盟的签证制度限制了土耳其的商业活动，希望在欧盟之外寻求新的市场。土耳其政府对很多中东和非洲国家放开了签证，也是为了响应他们的呼吁。此外，土耳其公司和商业组织还游说政府，要求他们在非洲设立新的使领馆，扩展与非洲大陆的经济关系。2002 年，土耳其对撒哈拉以南非洲国家贸易额仅 1 亿美元，2008 年增至 6 亿美元。

土耳其在本地区积极扮演调停人角色，这种努力很大程度上也是受到商业和贸易利益的驱使，因为周边地区的稳定和安全有利于其商业和贸易活动。在这方面，从政府的外交政策中得到了实惠的伊斯兰企业家也在发挥积极作用。2003 年以来，在库尔德人占多数的伊拉克北部地区，越来越多的土耳其企业在参与协助埃尔比尔的库尔德地方政府寻找政治和解的道路。

克里士基认为，土耳其政府做伊朗与西方关系的调停人部分也是出于经济上的考虑。尽管美国和欧盟对伊朗实施经济制裁，但正发党政府受到了主要是来自“安纳托利亚老虎”们要求扩大对伊贸易的压力。因此，正发党政府一面力推伊朗加入世贸组织，一面反对制裁，努力调停伊朗与西方的关系。2010 年 9 月，土耳其总统和外长相继在联合国表示，制裁有损土耳其的经济利益。而土耳其官员表示，两年内土伊贸易将翻 3 番，这种说法也让美国担心。安卡拉最大的担心是它的“经常账赤字”，而造成赤字的一个主要原因是能源进口。看一下土耳其—伊朗的贸易额即可了然：伊朗是土耳其最大的原油供应国和第二大天然气供应国，土对伊朗的出口额 2010 年是 30 亿美元，2011 年是 35 亿美元；而 2010 年土从伊朗的进口额是 76 亿美元，2011 年是 124 亿美元。由于

Kemal Kirişci& Neslihan Kaptanoğlu, “The Politics of Trade and Turkish Foreign Policy”, *Turkish Studies*, Vol. 47, No. 5, September 2011.

Ibid.

Ibid.

Svante E. Cornell, “Changes in Turkey: What Drives Turkish Foreign Policy?”, *Middle East Quarterly*, Winter 2012.

Kemal Kirişci& Neslihan Kaptanoğlu, “The Politics of Trade and Turkish Foreign Policy”, *Turkish Studies*, Vol. 47, No. 5, September 2011.

“Foreign Trade By Countries”, http://www.turkstat.gov.tr/VeriBilgi.do?alt_id=12.

天然气和石油价格不断攀升,两国间的贸易越来越失衡。土耳其不断增长的能源需求显示了其不断扩大的工业化现实,以及伊朗作为贸易伙伴重要性的增加。对土耳其来说,最棘手的是伊朗问题,因为这不仅涉及双边关系,还牵涉到与西方的关系。尽管2011年秋天,土耳其最终同意在本国领土上安装据分析是针对伊朗的反导雷达系统,但出于安全、能源和经济利益的考虑,土耳其仍在努力与伊朗保持良好关系,反对武力解决伊朗核问题。2012年年初有关以色列可能会单方面攻击伊朗的消息传出后,达武特奥卢当即表示,土耳其永远不会支持对伊朗动武。

土耳其的外交政策正在日益变为一种贸易国家寻求市场和经济利益的外交政策,而不是受意识形态驱使寻求根本的重新定位。即使在与以色列交恶后,埃尔多安政府威胁要断绝外交关系,却从未提及废除土以自由贸易协定,也从未阻碍两国人员往来。2010年,土耳其对以色列贸易额比2009年增加了25%,同期对欧盟只增加了17%。土耳其政府希望中东正经历的变革不要导致流血事件,其公民可以在整个中东自由往来,目标是把土耳其建设成中东重要的贸易、外交、教育和文化中心。正发党在竞选纲领中提出,到2023年,即建国百年时生产总值进入世界前十名,经济总量达2万亿美元,人均收入25000美元,出口达5000亿美元。要实现这一强国目标,旨在促进和扩大经贸合作的务实外交是一项重要条件和保障。

四、结语

无论是正发党上台之初大力推行入盟外交,还是其后开展多元务实外交,提出“零问题”主张,都离不开土耳其国内特有的社会政治背景,这些政策受到个体、政府和社会层面的多重影响和塑造。上述政策的实施一定程度上达到

Meliha B. Altunışık & Lenore G. Martin, “Making Sense of Turkish Foreign Policy in the Middle East under AKP”, *Turkish Studies*, Vol. 12, No. 4, December 2011.

“Turkey agrees to host missile early warning radar for NATO”,
<http://www.guardian.co.uk/world/2011/sep/02/turkey-missile-warning-radar-nato>.

“土耳其称对伊朗动武不可行不合理将永不支持”, 2012年2月14日,
http://news.xinhuanet.com/mil/2012-02/14/c_122701109.htm.

Kemal Kirişçi & Neslihan Kaptanoğlu, “The Politics of Trade and Turkish Foreign Policy”, *Turkish Studies*, Vol. 47, No. 5, September 2011.

Ibid.

“Hedefler”, <http://www.akparti.org.tr/site/hedefler>.

了正发党的预期，军队和传统世俗精英力量不断被削弱，正发党的执政地位更加巩固；国民经济快速增长，必需的外部市场得到了拓展；民族矛盾有所缓和。但也要看到，土耳其加入欧盟任重道远，与邻国关系“零问题”的目标也不可能一蹴而就，库尔德问题更是积重难返。

An Analysis on the Reasons of Turkish Foreign Policy under the Justice and Development Party

LI Zhiyu

Abstract Since the Justice and Development Party (JDP) came to power, Turkey has become increasingly active in the diplomatic arena. It has been taking unique policies and positions in some international issues. Its efforts to promote the EU accession process, the “zero problem” diplomacy, as well as the implementation of diversified and pragmatic foreign diplomacy, has raised widespread concern and research in the academia. This paper is trying to explain the reasons of the JDP government’s foreign policy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domestic politics in Turkey, so as to explain the adjustments and evolution of its foreign policy. The analysis is according to James N. Rosenau’s Pre-Theory of Foreign Policy, in terms of governmental, societal and individual variables.

Key Words Turkish Foreign Policy; Justice and Development Party; Islam; Domestic Politics

(责任编辑：杨 阳)